

講
題

第六屆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

世界政治的發展趨勢：
是否進入新冷戰時代？

王緝思教授
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



復旦大學
Fudan University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
<http://www.cuhk.edu.hk/shkdi>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

滬港發展講座系列成功舉辦，有賴李達三博士鼎力支持。香港中文大學為了感謝李博士的慷慨資助，特別將講座命名為「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由2013年起每年舉辦，邀請國際知名學者或經濟、金融及政策研究專家主講當前滬港的熱門課題，為學界、商界、政界精英以及老師、同學分析香港與上海發展，推動滬港雙城合作、學術研究與交流，從而切實地貢獻社會。

李達三博士簡介

李達三博士生於浙江寧波，畢業於重慶復旦大學會計學系，畢業後來到香港經營電器銷售，在1955年成立樂聲電器有限公司，憑著勤奮和獨到的眼光，使業務蒸蒸日上，分店遍佈香港以及東南亞各地，迅即成為國際大型企業。不久更獲得聲寶牌（Sharp）電器產品在香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地區總代理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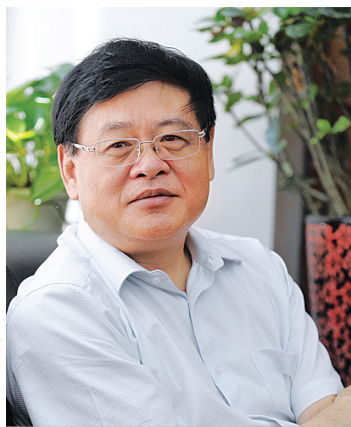
李達三博士在商界成就卓越，同時不忘關懷社群、興學助教。李博士自1976年獲邀出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新亞書院校董至今，和中大已有將近四十年的情誼。李博士對中大愛護有加、關愛學生無微不至，歷年捐贈學生助學金，及工商管理學院及電子工程系多項獎學金，又在1980年捐資興建李達三樓，幫助工商管理學院擴展之用。為了表揚李博士對香港商業及本校工商管理教育的貢獻，中大於1984年頒發榮譽社會科學學位予李博士。李博士也大力支持醫學發展，除了資助醫學院外科學系成立「肝膽胰基金」及「李達三訪問教授計劃」，又資助消化疾病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李博士時刻身體力行、回饋社會。2011年，在李博士的捐資和協助下，香港中文大學與寧波大學簽署李達三國際交流發展基金項目合作協議，共同推動雙方在學術和學生交流、科研以及人才培養方面的合作。2013年，中大再次得到李博士的鼎力支持，捐款協助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推動滬港雙城發展及合作、學術研究與交流，包括舉辦講座，為表謝意，中大把講座命名為「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2015年向李博士頒發大紫荊勳章，讚揚他長期參與社會及慈善服務，尤其對本港高等教育及人才培訓方面，不遺餘力，是一名備受尊崇的慈善家。



王緝思教授簡介

王教授是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社會兼職有中華美國學會榮譽會長等。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中國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現於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埃及開羅美國大學全球事務與公共政策學院、阿富汗戰略研究所、國際危機組織等單位擔任顧問，在《美國利益》、《全球亞洲》等刊物任國際編委。主要教學和研究方向為美國外交、中國外交、亞太安全。



第六屆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

世界政治的發展趨勢：是否進入新冷戰時代？

王緝思教授

2018年11月23日

非常高興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接受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和香港亞太研究所的邀請。我今天給自己出的題目是相當的大，可能很虛，但實際上會講到時政問題，這些時政問題會涉及到中美關係。我們說世界政治發展是否進入新冷戰時代，誰和誰會發生新冷戰呢？現階段恐怕只有中國和美國可能發生新冷戰。

從我自己的學術生涯來說，一開始我是研究國際關係的，現在還有一個學科叫國際政治。研究的時間長了以後發現，其實不研究國內政治、國內經濟，或者國內社會，沒有辦法理解國際關係。所以，我就自發把自己學科的名字改成世界政治，因為世界政治的研究範圍更大。譬如說，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跟國際關係有關嗎？基本無關，跟美國國內政治有關，但他上台以後把世界攪亂了。美國國內政治影響到整個世界的政治，也影響到中美關係，也就是說我們需要看到決定中美關係發展的主要因素是什麼呢？是美國政治和中國政治。其邏輯是從國內政治到國際政治。反過來，國際關係也會影響到國內政治。中美關係現在發展得好還是壞？會不會穩定下來？可能影響到中國政治，甚至影響到香港政治。所以我這個題目定得大，有學術上的道理。那麼我就從世界政治的發展趨勢說起。

和平與發展時代的世界政治

年紀大的人都會知道冷戰是怎麼回事，至少知道冷戰結束是怎麼回事。蘇聯垮台，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世界政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冷戰結束後，著名的日裔美國政治學家福山發表一篇文章，後來擴展成書叫《歷史的終結》，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他說人類歷史最終會走向民主、自由、法治。也就是說，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其他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都不行，都會讓位於民主制度。世界政治確實在那個時候發生了變化，俄羅斯和原來很多蘇聯加盟共和國，至少從表面上來看，都變成了西方式的民主國家。東歐也全部改變了自己的制度，變成了多黨制、走向民主化。非洲、拉丁美洲也是這樣，很多



國家都改變了原來的政治制度，朝向西方的民主化方向發展。跟民主化相適應的經濟制度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民主化制度非常時髦、得人心，但沒過很長時間，世界經濟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市場經濟在一些國家取得成功，但在某些國家不太成功，比如在非洲不那麼成功，在俄羅斯也不那麼成功。世界開始發生很大變化，變得多種多樣，民主是多種多樣的，經濟也是多種多樣的。

我們回過頭來，想想中國大陸四十年的發展，跟外部世界的關係是很大的。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之後，正是西方的民主制度開始鞏固、蘇聯的制度走向衰亡的過程。美國的列根和英國的戴卓爾夫人非常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主張市場經濟。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開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其實也受到那方面的影響。世界發生什麼變化呢？中國官方語言是這樣說的：我們進入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不管是在講這個話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還是到兩年前召開中共十九大的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主題。我想和平與發展應該是人類發展永恆的主題啊！一千年前人們就不需要和平了？一千年前就不要發展了？但是，其實這個世界確實發生了變化，就拿以下這兩點來說。

第一，戰爭已經很少了。經常有人說這不對啊，你看看敘利亞還在打仗、也門還在打仗。經常有暴恐事件發生，世界多亂啊。但是我有一些統計數字跟大家分享。現在世界上每年死於各種暴力、戰亂的人數大概是七十萬人。當然聽起來不少了，但這個死亡人數比例相當於一、二百年以前的五分之一。現在世界上已經很少發生戰亂了，死的人跟過去相比，在人類總數中所占的比例是相當小的。每年全世界在暴恐事件中死亡的人數，少算一點可能三萬多人，多起來可能五萬多。所以，應該說出現暴恐事件的機率很小。我拿另外一個數字說，大家就明白這機率有多小。全世界死於道路交通事故一年多少人呢？一百三十萬人，比五萬人多多了。所以，當我兒子要去倫敦時問我，倫敦安全嗎？我說你到倫敦，我不擔心你遇到暴恐事件，我擔心不要出車禍。因為出車禍的可能性大於恐怖事件。還有一點，不要自殺。為什麼說起自殺呢？因為全世界每年死於自殺的人數是七十萬，並且現在還在增加。其實，戰亂、暴力事件對人類的損害已經小得多了。所以，說我們現在身處和平的時代，還是比較準確。

然後我們又說這是一個發展的時代。根據經濟史學家的統計，今年世界上每一個人平均每天能掙三十三美元，換成港幣大概兩百左右。跟香港的工資水平相比低一點，跟中國大陸水平相比可能差不多。跟阿富汗水平相比呢，阿富汗每人每天只能掙三美元。人類歷史在進入二十世紀以前，每人每天只能掙三美

元。直到蒸汽機發明後進入輪船時代，稍後好一點。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人們還是很窮。現在餓死人的情況有沒有呢？有，很少，可是跟古代相比少了很多。平均起來，一天能夠掙三十多美元，是人類的巨大的進步，我在最近的書裏，把它叫作財富大爆炸。

這兩件事都是好事，戰爭威脅少了，人類財富增加。但是為什麼現在人們還是不滿意呢？世界政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就是，人類的財富分配太不平均了，達到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不平等。拿國家和國家相比，在最窮的國家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大概是五百美元到一千美元，還有比這個更低的。那麼最富的國家是哪些呢？歐洲有一個小國叫盧森堡，每人年均生產總值是一萬多美元。美國是比較富裕的國家，每年人均生產總值是六萬多美元。新加坡也很不錯了，五萬美元。世界上高收入國家比低收入國家富出一百倍，這在歷史上是沒有的。歷史上也有窮國有富國，比如說在鴉片戰爭時期，英國比中國富的多，但沒富到比中國多一百倍。但現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差距大到了這種程度。更重要的是，國家內部貧富差距也在增加。美國的貧富差距非常大，中國大陸也是這樣。發展不平衡、不均衡、不平等。這種經濟上、收入上的不平等就帶來了教育機會、醫療衛生等方面的不平等，從而使人不滿。

一旦遇到不平等和不滿意，人們就容易鬧事。以前人均收入比較平均，是怎麼造成的呢？第一，打仗，因為大家都打窮了，房子也炸了，什麼都沒了，大家一起受窮。還有一個辦法就是革命，暴力革命以後呢，把資本家的資產沒收，把地主的土地給分了，好像大家都富起來了，其實大家都不富。世界上哪裡有均富的地方？幾乎沒有，很少很少。現實就是這樣，貧富差距太大，全世界就因為這個而亂了。因此，第一不能打仗，第二不能搞暴力革命。有些極端主義者想搞革命，我們就說他們是暴力份子。譬如本·拉登說世界資本主義很醜惡，把世貿大樓給炸了。暴力革命不行了，戰爭也不是解決暴力的手段。剩下一個手段就是政府稅收，給富人多收一點稅，窮人少收一點稅或者不收稅。富人的稅收被用來再舉辦工業活動、扶貧，然後使社會稍微平等一點。但是，這樣的效果到現在還是有限的，許多人還是不滿意，因為政府替富人說話的多，替窮人說話的少。委內瑞拉政府表面是為窮人說話，實際上也還是為少數的富人說話。所以整個世界為不平等、不公義亂起來。

如果這種不平等、不公正單一民族的國家出現的話，相對來說，好糾正一點。我的研究表明世界上堅尼系數相對比較低的國家，全部都是單一民族國家。除了極少數，那就是新加坡。但是新加坡是一個很特別的國家，其他國家



或地區學不了。新加坡的政府太強大，用各種各樣的手段，通過犧牲一些目標的手段來達到表面上的平等。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不是單一民族國家，產生什麼問題呢？在歐洲，白人跟新移民，特別是從伊斯蘭國來的難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因為收入也不平等。有的人認為，收入不平等就是因為外國移民來了。全球化帶來的一個重大結果，就是人口的流動，導致許多國家或地區原來的人口結構發生的變化。我們也看到，西歐人不滿意南歐人和東歐人的湧入，不滿意土耳其人、摩洛哥人、敘利亞人的湧入。美國比較慶幸的是，從南美洲吸收的移民不信伊斯蘭教，而是信天主教。有很多具體數字說明，財富不均往往沿著不同族群、教派、膚色的人群展開，導致不同人群之間相互不滿，這就是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

我剛才提到的政治學家福山最新出了一本書就叫《Identity》。他的老師，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寫過《文明的衝突》，他最後一本書是《Who Are We?》（《我們是誰？》）。其主要觀點是，美國人本來是安格魯撒克遜新教基督徒，現在美國被很多外來人占領了。特朗普號稱他代表美國傳統白人基督徒，上台以後發表的言論簡直是驚天動地，趕得上一場大革命。「我來了，我要把華盛頓建制派全趕走，為美國人帶來新的生活，跟過去不一樣。他們是建制派，他們從來沒有考慮過我們窮苦百姓的生活啊。」你想想這麼一個有三十三億美元存款的人，居然說他代表窮人。但現在百分之三十多的美國人鐵杆支持他，因為那些人生活在所謂鐵鏽地帶，現在這個地方日落西山，原來的產業都不行了。這些人說，為什麼現在不行了？因為飯碗都被中國人搶去了。現在中國不但造鞋造襪，造汽車，造飛機，中國要搶我們的活路。這些人會選特朗普，因為特朗普代表他們的利益，會把外國的資本趕走，把移民趕回去，在墨西哥邊境收緊邊管不讓非法移民進來，得到一部分美國人的人心。俄羅斯也面臨這種情況，土耳其也有這種情況，埃及也有這種情況。那麼就產生了剛才我說的兩大基礎問題，一個是經濟不平等、政治不平等、社會不平等，另一個是族群關係，他們屬於不一樣的種族（ethnicity）和宗教（religion）。這些不同種族的人住在一塊，就開始鬧矛盾，搶地盤，慢慢的產生變化。

世界政治新階段的若干特徵

第一個趨勢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同時上升。民粹主義就是宣稱代表人民和

窮苦百姓的人向建制派、掌權的人、億萬富翁宣戰，把他們手裏的錢拿回來。民族主義跟民粹主義相呼應的地方在於，就像特朗普所說，國內那些有錢人的錢是怎麼來的？他們勾結外國人把美國的財富弄到那些國家去，美國人就變窮了。民粹主義者覺得美國應該第一，「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美國要再次強大起來。怎麼再次強大起來呢，把產業轉移回來，讓美國再次富起來，這就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做法。再就是增加貿易壁壘，跟中國打關稅戰，實行貿易保護，把財產收回來，給自己的國家、自己的人。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產生了很多民粹主義的政治家。說他們是右翼，他代表窮人的利益；說他們是左翼，其實他們內心深處非常保守，秉持白人至上的立場，這種現象在美國、歐洲、拉丁美洲都有。這是第一個大趨勢。

第二個大趨勢跟第一個大趨勢密切相關，是威權主義與強人政治回潮。大約半個世紀以前，環顧世界，有哪些政治強人？蘇聯有史達林、德國有希特勒、英國有邱吉爾、法國有戴高樂、美國有羅斯福、中國有毛澤東、蔣介石。冷戰結束後，沒多少強人了。現在強人又回來了。例如周邊國家中，馬來西亞有九十多歲的馬哈迪總統，印度莫迪總理、菲律賓杜特爾特總統等等。民粹主義者把受屈辱、受苦的人放在第一位。不過普通老百姓政治覺悟沒那麼高，社會將會因為一群人堅決擁護，另一群人堅決反對而開始分裂。如果政治覺悟高的話，美國不會選出特朗普當總統。可是不管怎樣，強人政治和威權主義的回潮給一些人帶來新的希望。大政府敢作敢為，帶來一個革命性的變化。我在美國教過書，知道什麼叫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就是說不要歧視婦女、不要歧視黑人、不要歧視同性戀者、不要歧視不同信仰的人等等。但是，現在民主化不吃香了，多元文化主義也不吃香了。

第三個是地緣政治和軍事競爭開始回來了。既然國家至上，國家軍隊也應該強大，警察也應該強大。近年來各種各樣的領土爭端開始出現，其實世界上許多地方都在產生地緣政治競爭。領土分裂、恐怖主義、暴恐事件頻繁發生，它們跟地緣政治衝突結合在一起。譬如說，本來敘利亞內戰是本國的事，結果現在俄羅斯、美國、歐洲、土耳其都介入。地緣政治衝突越來越嚴重，許多國家的軍費比過去增加了很多。其中，兩個地區的軍費增加最大最快，其中一個是亞太地區。最近美國副總統彭斯批評中國的時候說：「中國一個國家的軍費，比亞洲其他國家的軍費總和還多。」這大概是事實。但是日本軍費也在增加，印度軍費也在增加，而這麼做各自國內很少有人反對。地緣政治競爭加劇，導致戰爭的危險比過去增加。雖然國家基本上很少打仗，但是很難說一定不會打

仗。中國跟美國不打仗的可能性大，但是誰說一定不打仗呢？我不敢說。印度跟中國之間一定不打仗嗎？很難說。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一定不打仗嗎？更難說。所以現在戰爭的威脅增加了，而且戰爭的形式可能發生很大變化。過去用槍砲，現在用無人機。通過網絡戰、太空戰，不用犧牲士兵的生命就可以破壞電網、炸毀水壩等等。如果國家之間真正發生嚴重衝突的話，不一定需要導彈，用其他方式也可以使對方受苦。

第四個趨勢是人工智能和新技术的發展。在新技术的快速發展下，譬如電動汽車、無人駕駛汽車、機器人，被代替的工人會面臨失業。所以，人工智能和其他高技術的發展，很可能帶來進一步的貧富分化，導致國內矛盾深化。另外，醫療技術變得發達本來應該是挺好的一件事，可同時也導致殺人的手段隨之增多。新技术是一把雙刃劍，從各方面來看有好處、也有壞處。科學家們講好處講得比較多，但新技术的出現往往也會造成很多問題。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飛機、坦克，可能打不了那麼慘。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原子彈，可能也不會死了那麼多人。新技术的出現導致一旦發生大規模衝突，就會變得非常慘烈。現在新技术的發展日新月異，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怎麼把技術用在好的方面，而不是用在壞的方面。技術發展的另一個結果是，人的自由被剝奪很多。人們走到哪兒，見甚麼人，講什麼話，花了多少錢，政府都知道，人們還有那麼多的自由嗎？新技术的發展使人的自由大大減少，這就是世界政治發展的一些新趨勢。

中美是否進入新冷戰時代？

冷戰是怎麼出現的？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在二戰期間結成盟國，後來分道揚鑣。一個搞社會主義，一個堅持資本主義；一個搞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一個搞自由主義。二十世紀總共有三大意識形態：第一個是自由主義，以美國為代表；第二個是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先是以蘇聯為代表，蘇聯解體後以中國為代表；第三個是法西斯主義，最後被滅掉了，但是最近好像有死灰復燃的跡象。總之，後來就變成了兩大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競爭。不僅如此，美國和蘇聯各有自己的軍事集團。美國在1949年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蘇聯在1955年成立華沙條約組織。蘇聯還成立了經濟互助委員會，禁止社會主義國家參與美國建立的世界貿易組織（當時叫作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

一開始跟蘇聯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的政策是一致的，後來中國退出了蘇聯的陣營。

冷戰不僅是兩大軍事集團、意識形態之間的對抗，而且是兩大經濟集團之間的對抗，是完全對立的經濟制度之間的對抗。兩個集團之間不交往，變成了以美國為首的集團和以蘇聯為首的集團的對立。冷戰結束後，美國跟蘇聯（後來是俄羅斯）重新打交道，但是兩國之間的貿易額很少，反而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額逐年上升，中美之間的軍事和經濟競爭強度增大，出現所謂新冷戰的說法。我本人認為，冷戰的重要特徵是意識形態對抗，存在兩大軍事陣營，而且經濟上是脫鉤的。如果把冷戰看成美蘇之間那種狀況的話，現在中美關係沒有進入新冷戰。但是如果為新冷戰下一個新定義，界定國家之間的對抗就是冷戰，那中美之間的冷戰很早之前就出現了。

中美關係確實具備一些冷戰的特徵，例如意識形態上中國跟美國確實是對立的。但是中美關係和美蘇關係的不同之處也有很多，第一，世界政治陣營還沒有走到一邊跟美國走，一邊跟中國走的地步。現在整個世界是混亂的，不只有兩大意識形態、兩大政治制度。跟美國相似的國家很多，跟中國相似的國家也有，但沒有形成兩個意識形態的陣營。第二，冷戰期間兩個陣營在經濟上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但是現在中美兩國在經濟貿易上的往來太多了。中國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美國實際上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這一點跟冷戰時期很不一樣。

第三個不同是沒有軍事集團。當然美國跟韓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是軍事同盟，但是它們沒有完全把中國當成對象國，中國也沒有任何軍事盟國。從表面上來說，有人認為中國跟朝鮮是軍事盟國，但是中國不會給朝鮮坦克、核武器等軍事裝備，這叫什麼軍事盟國呢？所以中國沒有軍事上的盟國，也不打算建立軍事同盟。美國有軍事盟國，但要將所有的盟國變成對抗中國的軍事同盟，美國做不到，因為其他國家不想選邊站。我想現在沒有建立兩個對抗的軍事同盟的可能性，不是說沒有人想，而是實際上做不到。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美關係沒有進入新冷戰，而且不可能進入以前那種形式的新冷戰。但是，現在中美之間的矛盾很深、很大，而且越來越深、越來越大。我從五個方面簡短說說：

第一，美國國內政治。中國的國內政治我不好深入說，但我們自己覺得很強很厲害，「厲害了我的國」就是這種民族主義的代表性口號，美國人叫作必勝



主義。現在一說到妥協，中國人認為很難聽，怎麼能夠讓步呢？民主黨有反對中國的地方，譬如人權、宗教問題等等。共和黨以特朗普為代表，關注經貿關係。美國人對中國捲入美國國內政治很不高興，現在開始反過來說中國不要干涉美國內政，我們真是嚇了一跳。但是，現在事實是中國變成了美國國內政治很重要的一部分，罵中國變成很時髦的事情。講中國好話的人在美國有一個說法，叫Panda Huggers，中文是擁抱熊貓的人，跟我們講的親美派、投降派差不多。所以，在美國有很多中國問題專家不敢公開說話。一旦他們說中國好話，或者說中美關係好起來，就很不得人心，遭到很多人的批評。對於中國，美國國內政治出現一些不好的變化，特別是隨著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上升，很多地方針對中國，乾脆就說中國是美國的主要競爭者。與俄羅斯相比，中國是實力上升的國家，俄羅斯是實力下降的國家，所以中國成為美國人心中的挑戰。

第二個方面是經濟和貿易問題。兩國經貿關係中的一個核心內容是技術競爭，特別是高技術領域的競爭。美國認為，中國造鞋子、造襪子、造玩具都無所謂，但中國也要造軍艦、航母，商用飛機等，好像什麼東西都能造，那美國人還有活路嗎？西方從工業革命開始取得霸權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技術進步與壟斷。結果，現在中國在技術上要實現彎道超車，成為世界第一技術大國、創新大國等等。美國很不高興，指責中國留學生「偷盜」美國的技術，指責中國政府強迫美國企業在中國進行技術轉讓。可見，經貿關係的焦點在高技術領域，美國要制裁中國的地方也在高技術領域。

第三個方面是政治制度。美國之所以反對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美兩國的政治制度不同。日本跟美國也有經濟競爭，但美日在政治制度上差別不大。

第四個方面跟第三個方面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美國指責中國在世界範圍內輸出意識形態、社會制度，通過宣傳「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方案」，向全世界提供全新選擇。本來美國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就已經開始慢慢下降，相比而言，中國的吸引力越來越大。西方感覺到在地緣政治、經濟等方面，中國都在跟美國競爭。

最後一個是爭奪霸權的問題。美國向來認為自己是世界第一強國，但是美國認為現在全世界最厲害的，除了美國以外就是中國了。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在經濟總量上將超越美國，在技術上繼續追趕美國，這樣一來中美關係就變成一種世界範圍的權力鬥爭。美國政治學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寫了一本書，叫《修昔底德陷阱》，討論的核心問題就是中美會打仗嗎？修昔底德

是古希臘的歷史學家，寫了一本書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講的是雅典跟斯巴達之間的戰爭。修昔底德開宗明義地提出，「戰爭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此而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

這幾個方面決定了中美關係會繼續惡化下去，不太容易好起來。這不單單只是貿易問題，高技術領域的競爭，還有地緣政治，包括南海問題、朝鮮問題、台灣問題，以及美國也在談論的人權問題、新疆問題等。這不是單向度的問題，而是多向度的問題，解決一個方面的問題不能止住其他方面的衝突。所以我覺得，中美關係現在不容樂觀。

但是，如果往好處想，也有幾種可能性。一個可能性是，美國轉移焦點。另外一個可能性是美國經濟下滑，股票下跌，中美貿易戰打起來等等。美國人看下去，特朗普被彈劾，是不是中美關係就好轉？大家知道這個可能性不大。

美國的期待是在其壓力下，中國做出改變，但是這個是不現實的。中國肯定繼續改革開放，但是使黨的十八大、十九大以來堅持的政治路線，朝著美國人所希望方向發生變化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美關係會壞到什麼程度呢？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打仗。怎麼樣防止打仗呢？建立兩國軍人和軍人之間的某種關係，然後建立危機管控機制，防止戰爭的發生。另外一個危險是脫鉤，兩大經濟體分離，真正變成冷戰時候那樣，現在看起來很難成真。但是中國有人說：「脫鉤就脫鉤吧，我們自力更生，毛澤東那時候我們都挺過來了。沒有美國的合作就沒有吧，我們中國地域那麼大就養活不了自己了？」有美國人跟我說：「2003年以前美國跟中國的貿易也沒有那麼大，美國也活過來了。現在假如退回到2003年以前，美國一定要靠中國嗎？」實際上從技術上來說，脫鉤是非常困難的。中美之間打貿易戰對雙方都不利，各方面都會吃虧。所以我想指出兩點，一件是不要打仗，另一件是不要脫鉤。

問答環節

問：非常高興聽到你今天的演講，非常有深度、宏觀、非常成熟的一個分析。我有兩個小問題。第一，希望你詳細一點談談脫鉤這個問題。假如脫了，就不單是國內，對香港也會影響大，而且對全球的產業鏈，譬如說在新加坡、泰國、其他地方，可能有一些美資就會跑到泰國、其他國家。



第二點要請教你的是有學者提到中美關係，民主黨跟共和黨都針對中國。在八十年代，總是有一些學者出來跟中國說一些好話。到現在，我沒有看過一個美國的學者公開說中國的一些好話。所謂政治正確，表示這是他們的核心價值。中國故事、中國道路等等，讓美國很難得的機會形成兩黨共識。無論特朗普幹兩年、六年，我看不出中美的關係會有什麼改善，想聽聽你的說法，謝謝王教授。

關於第一個問題，首先脫鉤是一種願望，某些人有這個願望。美國民粹主義者批評中國人搶美國人飯碗，特別是中國在創新方面的動力很大，美國展開301條款調查，就是想要制止中國在美國高技術領域的投資。其次，實際上脫鉤也是一種態勢，美國已經開始少買中國的產品，少跟中國人打交道。雙方脫鉤的可能性存在於某些領域，譬如說有些美國在中國的工廠要搬走，或者威脅要搬走，原因是他們認為中國的限制很多，開放程度不夠，經濟政策不那麼透明，那麼他們的資金會轉到哪兒去呢？這就是個大問題。他們已經在中國待了二、三十年了，說走就走，容易嗎？在上海、在廣州、在北京、在香港，有那麼容易搬走嗎？即便是轉移，也要經過一段時間。但是如果中美關係持續惡化下去，那麼這些公司可能真的就會走。包括我所認識的很多中國公司的人，本來在美國是賺錢的，但是現在美國氣候很不好，他們就轉到日本、轉到發展中國家，事實上這就是一些脫鉤的跡象。特別是有人在鼓吹脫鉤的政治氣氛，打心理戰。美國總統經濟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最近寫一篇文章，說美國有一些人，叫全球主義的億萬富翁（globalist billionaires），指出高盛前總裁保爾森、麥克·布隆伯格（Mike Bloomberg）等人在中國賺足了錢，卻不替美國人辦事、而是替中國人辦事、替別的國家的人辦事。保爾森這些人心裡就產生一種恐慌，所以保爾森就站出來發表看法，說自己是美國愛國者（American patriot）。這也就說明，脫鉤的壓力存在。

第二個問題，確實是有很多人對中國不滿意，現在美國學者也受到很大壓力，就像冷戰初期那樣，對學者的人身攻擊已經開始出現。當然有些人對中國的很多批評意見也是真實的，包括本來對中國比較友好的人現在對中國的不滿情緒也在上升。這種不滿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其中有一個原因，是在二十年前、十年前，甚至八年以前，他們認為中國的行為和發展方向會越來越像美國，但這幾年看來不是這種趨勢，令美國很失望。譬如，我的學生到美國旅行、留學，在美國人看來他們應該是越來越美國化，但沒想到他們不是這個樣子，要加入中國「千人計劃」回到祖國服務，回到國內罵美國等等，美國人就感到很失落。這種失望情緒在美國精英裏頭比較普遍。

問：如果現在中美打仗了，我想問幾個問題。第一，打仗出師有名嗎？貿易逆差肯定不是一個太站得住腳的藉口吧。第二，有沒有盟友，英國、法國、北約會跟著美國打中國？如果沒有盟友，怎麼打呢？第三，打仗有沒有好處，難管理嗎？在這麼多方面考慮之下，打仗的機會怎麼樣呢？

打仗的可能性還是很小的。譬如像台灣，我所理解大陸對台政策並沒有發生變化，仍然是「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但是也有不少人喊，大陸要武力攻台，美國人也很著急。其實這裏面的邏輯是，中國人這麼喊，美國的軍工集團很高興，因為他們就可以造更多的軍艦和導彈。他們就會說，中國大陸對台灣的軍事壓力太大了，台灣受不了，美國應該向台灣出售武器，舉行軍事演習等等。如果我們真的迫不得已武力攻打台灣的話，美國會支持台灣。中國國內有一種輿論認為，美國怎麼敢去支持台灣呢？我覺得不應該這樣想問題。我們需要知道美國也是一個很強悍的國家。她跟台灣之間有《台灣關係法》，相當於條約關係，美國對台灣有許多承諾。所以美國的高級軍事領導人對我說，你們總說台灣對你們多重要，其實這不就一張臉的事嗎。中國人很要臉面，我們美國人也很要臉面。美國跟台灣已經有一種防護關係，存在幾十年了。美國信誓旦旦地說過多次要保衛台灣，如果中國大陸攻打台灣，美國不幫台灣，那以後在世界上還有誰相信美國的話？因此，這個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是雙方不會輕易就動手。

南海又是一個有點複雜的事情，但我認為中美在上述這兩個方面發生戰爭的可能性都比較小，兩國的衝突比較容易發生在貿易、政治等領域。甚至，美國會在民族、宗教等問題上給我們製造很多困難。

問：王老師您好，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就是這個修昔底德陷阱，其實Graham Allison教授有一個假設，是之前的一個霸權穩定論。一個國際體系秩序裏面，當以前的老大要退下來的時候，戰爭很難避免。但是你剛才講世界政治的新階段，在這種分析下，未必一定是按照只有一個霸權，不一定是中國或者是美國來主導。從您的分析來看，我想聽一下，在新的國際秩序的調整階段，出現一個比如是類似多極中心，或者是中美之間超越傳統一個霸權來穩定的可能性有多大？

第二個問題是講到中美關係的時候，您提到中美關係將進入新常態。中美關係的結構性矛盾會越來越多，除了結構性矛盾會增加之外，您對中美關係新常態的定義還有什麼重要特徵？

我們確實處於一個相當新的秩序中，像是你說的多極化吧，是多個國家力量的相對平衡。現在的問題是，我認為美國的實力還在上升，並不是在下降。美國每年經濟增長百分之二、百分之三，這個數字不得了。日本沒有那麼快，俄羅斯能夠實現百分之零點幾的增長就很不錯了。巴西經濟現在也不行，歐洲現在整體上發展速度也相當慢，比美國慢得多。所以，我不認為美國是一個衰落的國家。美國的問題是，雖然在經濟上和軍事上沒有衰落，但是打了兩場非常不得人心的戰爭（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國再也不想打這樣的戰爭，所以我認為美國跟中國也不會打仗。美國不想管外邊的事，想一心一意搞國內建設。歐洲去管理自己的事情，日本多承擔軍費，韓國也應該多承擔軍費。

還有一條，是美國學者說的軟實力。美國的軟實力確實下跌的很快。歐洲、中東國家都覺得，美國不是過去的美國了。美國的影響力、軟實力和世界形象都在下降。美國覺得中國現在變成最大的競爭對手，所以對別的國家稍微軟一點。特朗普不大管中東問題、非洲問題，但是想要制約中國。現在世界秩序開始因為中美關係的不穩定而變得更不穩定。中國主張多邊主義，美國主張單邊主義。中美在規則上的競爭很激烈。從中國的角度來說，我們現在承受的壓力比過去大，因為美國、日本、歐洲、澳大利亞這些國家在經濟規則方面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美國人在對付中國的時候，其他國家也高興地說：「對呀，應該對中國施加一點些壓力。」

中美關係的新常態跟過去不一樣的地方，是過去我覺得中美關係中競爭與合作兩方面五五開，分不出競爭更多，還是合作更多。現在我的看法發生了變化，中美關係中競爭面大大多於合作面，中美關係更多是一種競爭關係，而不是合作關係。當然，合作的領域還是有的，但中美合作的領域不是在進一步擴大。以前中美關係有三個關鍵點，一是經貿合作；二是安全合作，包括在朝鮮半島等問題上；三是人文交流，主要表現在大學跟大學之間、科學家跟科學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等等。現在的情況是，美國採取非常多的措施限制兩國之間的人文交流。

問：中美貿易戰對中國內部有哪方面的影響？

答：中美的貿易摩擦肯定對中國國內的政治產生比較大的衝擊。首先，從戰略上來說，本來我們認為現在仍是和平與發展時代，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等等，我們的宣傳中很重要的一個基礎就是中國跟美國有合作，可以建立「新型大國



關係」：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現在基礎發生了動搖。像過去那樣，把形勢看成美國跟中國合作基礎在擴大是行不通了。

具體來說，實際上涉及到中國的發展道路。美國人現在跟中國人要較量的是，到底中國的發展模式能不能持續下去。美國想說的是，中國的發展模式不行，不單對美國不利，而且是不公正的、不對等的。所謂對等（reciprocity），就是我對你市場開放多大，你就對我市場開放多大，我對你市場開放的很大，結果你的市場對我不夠開放，那麼我就要整你。以前，我們可以說美國整中國是為了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維護美國的利益。但是現在看起來，美國一些人並不是純粹把這個目標放在中國擴大開放、消除貿易壁壘上。開放、自由的貿易未必對美國真正有利，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經濟學問題。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到底是不是可以變成互利共贏，還是說確確實實你贏就是我輸。譬如說，如果我們也能製造波音這樣的大飛機，達到市場份額占世界三分之一，那就把美國的市場給擠掉了。在這方面，美國不想讓中國發展起來。所以中國要這麼做，美國就封鎖中國。中國造商用飛機的雄心很大，但很多技術和零部件掌握在美國、歐洲國家手裏。這就是問題的焦點。

高技術領域的競爭是問題的焦點，美國逼著我們在產業政策方面必須做出調整。怎麼調整？有人說，也許美國在經濟上給我們的壓力可以變成我們改革的動力，促使我們進一步改革開放。但是也有完全相反的意見認為，美國要改變我們，如果我們按照美國說的做會賣國。政府也很擔心這樣一種輿論，所以從我個人觀察來看，現在主流的想法還是要把軍事方面穩定住。我們還得堅持改革開放，美國人提出的一些要求我們是可以滿足的，而且滿足這種要求對我們的長遠利益不會造成很大損失，甚至可能有某些好處，但是我們不能讓步太多。很具體的問題是，美國到底要什麼，我們不是很清楚，美國也不肯說清楚。不說清楚，那怎麼談呢？美國不露底牌，我們也不能露底牌。現在美國政府跟過去不一樣，難以打交道，我們不知道特朗普政府的底牌是什麼。中國政府很為難，很難滿足美國的需要。即便滿足了這個需要，也許美國又提出下一個讓中國無法滿足的要求。如果中國跟美國妥協太多，會影響國人的信心。所以，中美貿易戰對中國政治產生了戰略、經濟、政治等方面的衝擊，也導致國內民族情緒上升。



問：教授您在國內算是少數還是多數呢？我猜你是少數，因為國內有很多人不是好像教授您那麼理性的。我比較悲觀，中美之間的鴻溝也是填補不了的，最終走向脫鉤和戰爭兩個可能性。不知道您同不同意，謝謝。

我這麼一個小人物，談不上是少數還是多數。我代表不了什麼人，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同時，我也確實知道很多人批評我。所以，如果我說了什麼東西、寫了什麼東西，我不去看留言，因為基本可以肯定有留言是罵我的。所以慢慢地臉皮就變得比較厚了。

首先，我不會違反外交方針、政治方針，我內心深處也是個愛國主義者。坦率地說，還是有些人覺得我的想法是有道理的。我可以從理性出發，做一點點說服美國人的工作。有些人跟美國人說，中國要回到文化大革命了。實際上現在不是文化大革命，遠遠沒有到文化大革命的地步。社會還是需要有理性的聲音，在政府裡頭也確實有很多理性的聲音。

我剛才也多少透露了一點中國跟美國談判的方針。第一，中國還是要跟美國談的；第二，中國不想翻臉。特朗普總把一句話放在嘴邊，他說：「我很尊重習近平主席，他是我的好朋友。」如果想跟美國鬧翻很容易，就回他一句：「你不是好朋友。」但我們國家領導人不說這個話。所以從政府的大方向來說，還是溫和的、緩和的，穩定中美關係這種聲音是主流。

網上的極左聲音會強硬一點，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做政策研究的人、在政府裏頭處理具體工作的人，是相當謹慎、小心的，能夠把握大方向。當然有的時候堅持大的政策方向也會出一些問題，世界很大，雖然中國不想得罪人，但是實際上也不可能不得罪人。

鳴謝

香港中文大學蒙

李達三博士慷慨捐助成立李達三博士滬港發展講座

謹此致謝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電話：(852) 39436762

電郵：shkdi@cuhk.edu.hk

傳真：(852) 26035215

網址：<http://www.cuhk.edu.hk/shkdi>